

跨文化视域下《嫂子》与《金锁记》的女性抗争叙事比较

莫呷呷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 610041; 2446943903@qq.com)

摘要:《嫂子》与《金锁记》作为聚焦女性命运的文学作品, 分别以传统婚姻制度与封建家族文化为背景, 深刻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嫂子》通过彝族女性“嫂子”的逆来顺受与无声抗争, 控诉了“家支外婚”“等级内婚”等制度对女性的压迫; 《金锁记》则以曹七巧的扭曲人格与疯狂报复, 批判封建礼教与金钱枷锁对女性人性的异化。文章结合文本比较分析, 从女性形象、主题表达及叙事手法等维度切入, 揭示两部作品在女性主义思想上的异同, 分析不同社会语境下两女主人公命运的共性与特性以及反抗方式的异同, 以期深化对这两部作品的认知。

关键词: 女性主义; 抗争叙事; 《嫂子》; 《金锁记》

引言

女性主义视角的比较研究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与地位变化。《嫂子》与《金锁记》作为两部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学作品, 在女性文学领域占据着独特地位。《嫂子》出自彝族女作家阿蕾之手, 以细腻笔触展现了彝族女性在传统婚姻制度与社会习俗束缚下的悲惨命运, 是对彝族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刻剖析。而张爱玲的《金锁记》则描绘了曹七巧在封建家族与金钱枷锁下扭曲的人生, 将女性在男权社会和物质压迫下的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通过对两部作品女性主义视角的比较研究, 我们能清晰看到不同文化对女性命运的塑造与影响。《嫂子》所处的彝族文化环境, 有着独特的婚姻制度和社会习俗, 如“家支外婚、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姑舅表优先婚、姨表不婚”[1]等, 这些制度成为束缚彝族女性的枷锁。而《金锁记》所展现的是封建大家庭中女性的困境, 封建礼教和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在不断变革, 女性的地位也在逐步改变。研究这两部创作于不同时期的作品, 可以了解到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下, 女性是如何在困境中挣扎、觉醒, 以及为争取平等地位所做出的努力。

通过运用文本细读法, 比较分析法, 从女性形象出发, 将作品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考量, 将《嫂子》与社会文化、婚姻制度紧密相连, 把《金锁记》与封建礼教、家族文化相结合, 从而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作品中女性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和意义。

1. 《嫂子》与《金锁记》中的命运的相似性

1.1. 受传统制度压迫的悲剧结局

“嫂子”与曹七巧虽身处不同文学世界, 但都在传统制度的压迫下走向了悲剧结局, 深刻展现出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摧残。

在《嫂子》里, 嫂子的命运深受彝族传统婚姻制度的操控。自幼父母双亡的她, 在姑舅表优先婚的强制安排下, 未成年便嫁给了比自己还小的表弟柯惹。这样的婚姻并非基于爱情, 而是家族利益和传统习俗的安排。柯惹稚气未脱, 无法给予嫂子应有的关爱和依靠, 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幸的。不久公婆相继去世, 嫂子承担着繁重的家事和事务, 在森林里遭到阿蕾家的女婿沙玛拉惹强暴后并有了身孕, 他们请求邱莫乡长让他们结婚, 在遭到指责和拒绝后, “嫂子”随沙玛拉惹一起双双殉情。嫂子的悲剧, 是传统婚姻制度对女性自由和幸福的残酷剥夺, 她在这种制度下, 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只能以死亡来反抗这不公的世界。

曹七巧在《金锁记》中的遭遇同样悲惨。她出身小商户家庭, 却被兄嫂贪图钱财, 嫁给了姜家患有软骨病的二少爷。在姜家这个封建大家庭中, 她因出身低微备受歧视, 丈夫的残疾又使她的正常情欲无法得到满足, 长期处于压抑和痛苦之中。在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下, 她的人性逐渐扭曲。她对爱情的渴望被无情扼杀, 与姜季泽的感情也因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而无法实现。夫死公亡后, 她虽分得遗产, 却陷入了

金钱的枷锁，变得自私、刻薄、变态。她破坏儿女的幸福，最终孤独地死去。曹七巧的悲剧，是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对女性身心的双重摧残，她在这种环境下，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女子变成了一个被仇恨和欲望支配的人。

从女性主义理论角度来看，“嫂子”和曹七巧的悲剧结局体现了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过去、历史和宗教。她们散居于男人之间，不论是住所、工作、经济资源、社会地位都依附于某些特定的男人”[2]。嫂子和曹七巧都无法摆脱传统制度的束缚，成为了男性和社会的附属品，她们的命运被他人主宰，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她们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反映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不公。

1.2. 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

“嫂子”和曹七巧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都经历了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过程，她们的觉醒之路充满了阻碍，受到社会观念和自身认知的双重束缚。

“嫂子”在传统婚姻制度的压抑下，最初默默忍受着不幸的婚姻。丈夫柯惹年幼不懂事，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只能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任。然而，沙玛拉惹的出现，唤醒了她内心深处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嫂子》中有这样一段话：“而最终从那天以后，沙玛拉惹又接连撬开了三四晚嫂子家的门，再后来不知是嫂子先就留门了，还是沙玛拉惹来了才开的门，反正沙玛拉惹进出嫂子家就像进出自己家那么方便了[3]。”潜伏在嫂子无意识中的觉醒是她对传统婚姻制度的反抗，但她的觉醒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社会的传统观念认为她与沙玛拉惹的感情是不道德的，违反了彝族的婚姻习俗。在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嫂子的反抗显得无力，她最终选择与沙玛拉惹以生命为代价来追求自由和爱情。她的觉醒过程，是一个从默默忍受，到逐渐觉醒，再到反抗失败的过程，充满了痛苦和无奈。

曹七巧的女性意识觉醒同样艰难。在姜家，她长期遭受歧视和压抑，丈夫的残疾使她的情欲无法得到满足，她的正常情感需求被忽视。但她并没有完全屈服，她对姜季泽产生了感情，这是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她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试图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然而，她的觉醒受到了自身认知和社会环境的双重限制。出身低微，在姜家缺乏地位和话语权，她的反抗往往被视为叛逆和不道德。同时，对金钱的渴望和贪婪，也使曹七巧逐渐迷失自我，陷入了金钱的枷锁。她的觉醒之路充满了曲折，最终以悲剧告终。

从社会观念方面来看，传统的男权社会观念认为女性应该顺从、隐忍，女性的意识和需求被边缘化。“嫂子”和曹七巧的觉醒行为违背了这种传统观念，因此受到了社会的排斥和打压。从自身认知角度而言，她们在长期的压抑环境中，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着对传统观念的认同，这使得她们在觉醒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挣扎。她们的经历表明，女性意识的觉醒需要突破社会和自身的重重障碍，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2. 《嫂子》与《金锁记》中女性主义表达的差异

2.1. 反抗方式的不同表现形式对比

“嫂子”与曹七巧在反抗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这源于她们各自独特的生活经历、性格特点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

“嫂子”是美丽、善良、勤劳的代名词，又是封建习俗礼教的温顺奴隶。长期生活在传统的彝族乡村社会，深受传统婚姻制度和社会观念的束缚。她在面对不幸的婚姻时，最初选择了默默忍受，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沙玛拉惹和“嫂子”的“婚外情”，甚至为爱殉情，是对彝族传统包办婚姻的强有力冲击与挑战，是对摧残人性制度的抗争与背叛，是寻求自我精神家园的失落与寄托。正如邱紫华先生所说：“美学悲剧性是指主体为了实现对自身现实的超越，或为了抗拒外力的摧残而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他们往往处于无从选择的‘两难’或‘动机与结果完全持反’的灾难里，但是面对灾难他们敢于殊死抗争，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超越苦难和死亡，从而显示出超强的生命力，把全体自身的精神岁月和超人的意志力提升到崭新的高度，展示出人生的全部价值[4]。”“嫂子”的反抗方式体现了她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她试图打破传统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她的反抗缺乏理性和策略，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显得无力。

曹七巧则不同，她泼辣、精明。在姜家这个封建大家庭中，她遭受了诸多歧视和压迫，长期的压抑使她的性格逐渐扭曲。她的反抗是在长期的痛苦和压抑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她对姜家的人充满了怨恨，常常以尖刻的言语和泼辣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在爱情方面，她大胆地向姜季泽表达爱意，试图追求自己的爱情幸福。这种反抗是对封建礼教束缚下男女情感压抑的挑战。在经济上，她为了争取自己的财产权益，在分家时与姜家的人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与他们争吵、哭闹。然而，曹七巧的反抗逐渐走向了极端，她在爱情和经济上的追求受挫后，开始变得自私、刻薄，对身边的人进行报复。她破坏儿女的幸福，成为了一个令人憎恶的人。她的反抗方式从最初的争取自由和权益，逐渐演变成了对他人的伤害，失去了反抗

的积极意义。曹七巧的反抗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挣扎和无奈。她的反抗虽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斗争性，但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支持，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

2.2. 文化背景对女性命运的影响

《嫂子》与《金锁记》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女性命运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在婚姻制度、社会观念等多方面体现出显著差异。

在彝族文化中，传统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束缚极为明显。以姑舅表优先婚为代表的婚姻习俗，将女性的婚姻选择局限在特定的家族范围内，女性几乎没有自主选择婚姻对象的权利。“嫂子”的婚姻便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她在未成年时就被嫁给表弟柯惹，这段婚姻并非基于爱情，而是家族利益的考量。在这种婚姻制度下，女性成为了维护家族关系的工具，她们的个人情感和幸福被忽视。彝族社会中，家支等传统势力强大，对女性的行为和思想有着严格的规范和约束。“嫂子”与沙玛拉惹的感情，因为违背了传统的婚姻观念，最终导致悲剧结局。这种文化背景下，女性的命运被传统习俗和社会观念紧紧束缚，她们的反抗往往受到极大的阻力。

在《金锁记》中，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更为复杂和深刻。在封建大家庭中，女性不仅在婚姻上没有自主权，还在经济、人格等方面受到严重的束缚。曹七巧被嫁给姜家残疾的二少爷，她的婚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在姜家，她因出身低微备受歧视，经济上完全依赖于家族，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言行举止有着严格的规范，女性必须遵守三从四德等传统道德观念。曹七巧的反抗行为，如对姜季泽的爱情追求，被视为不道德和叛逆的行为，遭到了周围人的排斥和打压，使女性在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道路上面临着重重困难。

不同的文化背景塑造了不同的女性命运。在《嫂子》中，女性更多地受到传统婚姻制度和家族势力的束缚，她们的反抗往往是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婚姻；而在《金锁记》，女性受到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的多重压迫，她们的反抗不仅涉及爱情和婚姻，还包括对经济独立、人格尊严等方面的追求。文化背景的差异，深刻地影响了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也反映了不同文化中女性主义表达的独特性。

2.3. 觉醒与挣扎的表现形式对比

“嫂子”与曹七巧在女性意识觉醒与挣扎的表现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嫂子”的觉醒与挣扎表现得极为含蓄内敛。她长期生活在彝族传统婚姻制度的阴影下，这种制度所带来的压迫和束缚，反抗意识被深深压抑。她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最初只是在内心深处暗自涌动，不敢轻易表露。在与沙玛拉惹产生感情后，她虽有反抗的想法，但行动上却十分谨慎。她深知自己的行为违背了传统习俗，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因此在与沙玛拉惹相处时，充满了矛盾和挣扎。她的反抗更多地体现在一些细微的行为和表情上，如在面对丘莫乡长的拒绝时，她默默流泪，眼神中透露出无奈和绝望，这种无声的反抗，是她在强大的传统势力面前，无力抗争的表现。

相比之下，曹七巧的觉醒与挣扎则显得异常激烈。她身处封建礼教和金钱的双重压迫之下，内心的压抑和痛苦达到了极点。她的反抗从一开始就毫不掩饰，以泼辣的言语和大胆的行为，向封建礼教和不公的命运发起挑战。在姜家，她面对众人的歧视和排挤，毫不畏惧地用尖酸刻薄的语言进行反击，毫不留情地揭露姜家人的虚伪和丑恶。在分家时，她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与姜家人大吵大闹，甚至不惜使用撒泼耍赖的手段。她对爱情的追求也同样大胆，主动向姜季泽表达自己的情感，毫不顾忌封建礼教的束缚。她的这些行为，充分展现了她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对自由的渴望。

在挣扎程度上，“嫂子”的挣扎相对较为温和。虽然对传统婚姻制度不满，但由于自身的软弱和对社会舆论的恐惧，“嫂子”的挣扎更多地停留在内心层面，很少付诸实际行动。心存顾虑，缺乏坚定的信念和勇气。而曹七巧的挣扎则更为剧烈和持久。她在封建礼教和金钱的压迫下，不断地进行反抗和挣扎，从最初的言语反抗，到后来的行为反抗，她的每一次挣扎都充满了痛苦和无奈。即使在反抗失败后，她也没有放弃，而是将内心的痛苦转化为对他人的报复，这种挣扎已经深入到她的灵魂深处，使她的性格发生了扭曲。最终却以悲剧收场，甚至祸及两代人，正如小说结尾所写：“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5]两人不同的表现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意识觉醒与挣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3. 结论

《嫂子》与《金锁记》折射出了父权制社会下女性命运的共相与殊相。作为传统制度的牺牲品，“嫂子”与曹七巧的悲剧命运殊途同归：前者因封建传统婚姻制度沦为家族联姻的工具，后者因封建礼教与金钱异化被困禁于黄金枷锁中。她们的婚姻自主权被剥夺，情感需求被压抑，最终以死亡或畸变的反抗形式控诉性

别压迫的结构性暴力。二者的觉醒历程虽充满坎坷，却成为女性意识萌芽的隐喻——“嫂子”以殉情完成对自由爱情的终极追寻，曹七巧则以扭曲的报复揭示封建伦理对人性的绞杀。

两部作品的反抗方式与文化语境深度互文。封建传统婚俗的显性规训，使“嫂子”的抗争局限于情感层面的隐忍与爆发；而封建家族中礼教、资本与男权的共谋，则令曹七巧的反抗兼具经济争夺与人性异化的复杂性。这种差异印证了女性主义表达的多元性。无论是“嫂子”对爱情的殉道式追求，还是曹七巧以物化自我为代价的疯狂报复，均暴露出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突围的艰难。

参考文献

- [1] 林耀华.凉山夷家 [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 [2]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M].邱瑞銮.台北: 猫头鹰出版社, 2013.
- [3] 阿蕾.嫂子 [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 [4] 邱紫华.悲剧精神 [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10-12.
- [5] 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 [M].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